

烽烟滚滚旌旗红

—— 郭尔罗斯民主革命时期斗争述略

(一)

打开中国地图，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地域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人”字形河流。这“人”字的一笔是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从北向南流的嫩江；另一笔就是发源于长白山天池从南往北流的第二松花江。这“人”字两笔的联结点就在前郭尔罗斯。两江在这里汇合后，才掉头向东流经哈尔滨、佳木斯至黑河口处汇入黑龙江，于鞑靼海峡入海。

前郭尔罗斯位于吉林省中西部。东北、北临第二松花江、嫩江，与扶余、肇源隔江相望；南与农安交界；西南、西与长岭、乾安毗邻，北与大安接壤。

今天，从长春乘特快列车，沿长白线北行，只需两个半小时就可到达前郭尔罗斯（以下按历史的叫法，称“郭尔罗斯前旗”或简称“郭前旗”）。这是个铁路、公路、航运都很发达的地方。

在解放战争烽烟滚滚的年代，我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驻地在哈尔滨。敌新七军、六十军就盘踞在长春。从农安到长岭，从四平到洮南，是敌我争战的前沿。我西

满指挥中心——西满分局、西满军区曾一度设在洮南，设在齐齐哈尔。郭前旗可以说是西满的东部门户，是坚持北满进取长春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郭尔罗斯是个古老的蒙古草原。古郭尔罗斯部是蒙古“弘吉剌惕”部的一个支系。

古郭尔罗斯部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有名的人物。史载，成吉思汗第十一代先祖朵奔蔑儿干的妻子被尊称为蒙古族三贤圣母的阿阑豁阿夫人是郭尔罗斯氏。据学者考证，成吉思汗身边“笔帖士”薛赤兀儿是闻名世界的《蒙古秘史》的作者之一，薛赤兀儿也是郭尔罗斯人。1202年，岁次壬戌，成吉思汗用兵郭尔罗斯。《蒙古游牧记》载“元太祖遣弟哈布图哈萨尔征郭尔罗斯部，擒其酋纳琳于克哩业库卜克尔。”郭尔罗斯部遂为哈布图哈萨尔所据。

1547年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世孙奎蒙克哈斯塔喇率部东迁，建嫩科尔沁，奎蒙克哈斯塔喇之孙乌巴什以古部号建郭尔罗斯部，成为嫩科尔沁四部之一。清顺治五年（1648），清在蒙古地域实行盟旗制，郭尔罗斯前旗成为哲里木盟十旗之一。1932年划归吉林省至今。

今日的前郭尔罗斯草原，宛如一只秀美的蒙古靴，横亘松辽大地。嫩江、松花江如同一条闪光的银线，缝绣着靴子底。沿着这条银线，长白铁路贯穿郭尔罗斯的东南与西北。“靴子腰”处是碧绿如茵，一望无际的肥美草原。一座号称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的查干湖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靴子尖”上。

《辽史》载，自辽圣宗起，直至天祚帝，历代皇帝几乎每年春初都要到这里巡幸、春猎；“弋猎网钓”；“春尽乃归”。这浩浩瀚瀚的查干湖与霍林河、松花江、嫩江相依相通。在这三江汇聚之侧，在有名的“七十二道湾”之旁，一座“他虎”古城，

辽金时屹立于岸边。滔滔江水，巍巍古城，给这里更增添了几分险峻，几分雄伟。

沿江南去约 100 公里，在山环水绕，树木苍翠的哈拉毛都，昔日曾有座占地 6 万多平方米，院落 7 进，房屋 640 余间的“亲王府”，是郭尔罗斯前旗末代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的府邸。齐默特色木丕勒光绪二十三年（1897）袭扎萨克，光绪三十一年（1905）晋为哲里木盟盟长。1908 年在哈拉毛都西山之侧破土兴建府邸。经 6 年，于 1914 年在他被晋封为“和硕亲王”时这座颇为堂皇的“亲王府”落成。

齐默特色木丕勒是郭尔罗斯前旗旗祖固穆之后第十二代扎萨克。他曾参加过平息乌泰叛乱的斗争，但也参加过清王朝镇压陶克涛胡起义的征伐。晚年还登上了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蒙政部大臣的“宝座”。1937 年卸任，1942 年 69 岁病故。子早亡，无嗣。

中西部和北部江湾都有良好牧场。据 1941 年统计，全旗总人口 146 861 人。其中蒙古族人口 21 205 人。蒙古族人民多半有自己聚居的村屯。其居住区在全旗总体上看是大分散，小聚居。蒙民聚居区保持着民族语言、风俗和传统生活习惯。西部查干花、黑帝庙（今乌兰敖都）、大老爷府（今乌兰图嘎）等为蒙古族居民高度集中的村屯。解放初，老人、妇女、孩子多不懂汉语。在这样村屯居住的汉人也多说蒙古话。

本世纪初，随着清廷推行“移民实边”，大批黄河沿岸的河北、河南、山东的难民和热辽一带破产的蒙古人进入郭尔罗斯。

王公出卖了草原，肥了王公，苦了牧民。蒙古族人民，特别是贫苦牧民失去了牧场，被迫改牧业为半农半牧，或完全变成农业。牧民世代以游牧为业，不尚农耕。被迫由牧放改农

耕，粗耕粗作，所收无几，生活十分贫苦。

汉族流民中，有些是工于钻营者。他们中无论是从蒙古族地主手中租来大片土地，然后再行出租的地揽头、经营地主，还是直接雇工耕种的地主或自己参加一些劳动的富农，剥削多比蒙古族地主还要苛刻。汉族流民中多数是挑着孩子，领着妻子的逃荒者，和蒙古族牧民一样，受着沉重的盘剥。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伪更变本加厉搞牛马、粮食“双出荷”，使蒙汉贫苦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饥寒交迫的贫苦农牧民有如千里荒原的野草，一旦投以火种，顷刻间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九·三”解放，人们回到了祖国怀抱，无不期待着一种新的命运。然而，仅有良好愿望是不行的，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打内战，使这里又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二）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3日纳粹德国投降。不久，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日本侵略者已清楚地预料到了它的末日即将来临。

时局在急剧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急剧变化。

前郭尔罗斯有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在各地读书，如伪建国大学的高万宝扎布、望吉乐、达西尼玛，法政大学的拉西道尔吉（孙殿忠）、厚和，医科大学的胡力陶皋、胡殿魁，兴安学院的图拉古尔（晓波、康心）、张增命、思勤、七宝，日本文理科大学的巴图桑嘎，吉林师大的呼和满达，工业大学的巴图等。还有一些人在扎兰屯、开鲁、兴安的国高、女高、师道等学校读书。他们中有些同志已从收音机里了解到世界东西方

两个战场的形势，知道反法西斯战争就要胜利了。进步的学生们无不欢欣鼓舞，无不在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伪建国大学学生高万宝扎布迫不及待地与他的同学、好友相互约定暑假期间回家乡聚会。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蒙古民族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

蒙古族曾是个强大、英勇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时期，这是蒙古人的骄傲。但明清以来，民国以来，却不断出现令人痛心的民族悲剧。

清王朝建立后，清廷推行“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的策略，清王室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造成了一片虚假的满蒙亲善的景象。但蒙古族却不断遭受着严重地摧残。仅清统治者大力鼓励、扶持、发展蒙古喇嘛教这一手段，就使蒙古族人口由 300 万锐减到 200 万，并化勇武为温顺。据《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录》载，根据 1937 年统计，郭尔罗斯邻界的科左中旗有寺庙 74 座，喇嘛 3 544 人，竟占全旗男性的 30%。而阜新、小库伦、归绥等更有甚者。情况的严重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清廷内外交困，国库空虚。为苟延残喘，他们把危机转嫁到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身上。以“移民实边”为名，出卖蒙旗土地。蒙古王公贵族与汉族军阀官僚相勾结，鱼肉百姓，大量出卖蒙古人民的良田牧场。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为巴结上级，争得哲里木盟盟长席位，从 1905 年起连续出卖了宝巴（农安）、阿阳吐（德惠）的全部土地。又进而想开放蒙古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嫩江、松花江沿岸的“他虎荒”、“二龙索口荒”、“赛音胡硕荒”。这一行径如果得逞，郭前旗的蒙古族人民群众将被迫全部退到沙荒、碱甸子去，这怎能不激起蒙古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对。他虎城下二郎

三家子豪克台吉陶克涛胡代表群众去王府请愿，不料王爷不仅不准，还把陶克涛胡处以杖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陶克涛胡于 1906 年 9 月 23 日凌晨率众起义。清廷立刻下令东北三省督军和哲里木盟十旗重兵围剿。陶克涛胡率部与清军血战 4 年，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进一步推行大汉族主义，不断蚕食民族区域，使少数民族人民更加日益贫困化。

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当今世界各个先进民族腾腾火火地办实业、开矿产、兴科学、搞教育；而茫茫草原上依旧是一片荒凉、贫困、愚昧、落后的可悲景象，凡是有热血的蒙古青年，怎能不为之痛心，为之焦虑，为之呼喊，蒙古同胞赶快觉醒，劈枷断镣，跟上时代的脚步，进入先进民族的行列！

为寻求民族解放，郭前旗蒙古族优秀青年包彦（又名包明顺、包正言），1938 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

为痛击日寇，郭前旗在伪兴安陆军学校学习的学生包永吉、包荣吉等，勇敢地参加了 1945 年葛根庙的“八·一一”起义。

在大学学习的高万宝扎布和他的大学、中学同学怀着振兴民族的愿望，暑假中许多人没有回家，都按约定时间到一起聚会，商讨民族振兴大计。但是，没过几天就有人告诉他们，日本人和警察在注意他们。他们想到困兽犹斗，日暮途穷的侵略者一定会比以往更凶狂。于是，他们决定暂时分散活动，静观事态发展，迎接新的斗争。

有一位文学家说：“任何一种命运，尽管它也许是漫长而复杂的，实际上却反映在某一瞬间……”郭前旗的一些蒙古族先进青年，他们一生旅途的选择，他们一生命运的确立，也是如此。

就在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胡力陶皋等分散活动的时候，却意外地会见了一位引他们走向新生活的人。

那是 1945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高万宝扎布经一位农村朋友钢·图木尔介绍，认识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健民。高万宝扎布与刘健民相识后，倾吐了对自己民族的忧虑和振兴民族的心愿。刘健民赞同高万宝扎布的想法并介绍了关内国共两党的情况。不久，法政大学学生拉西道尔吉、奉天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胡力陶皋也与刘健民结识。

“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刘健民公开了身份。他们共同探讨民族解放之路，并提出要成立一个团结蒙古族青年，为振兴民族而斗争的组织。

就在这时，刚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归来的陶特格琦也参加了讨论。

陶特格琦（又名包文明），1918 年出生，郭前旗昂格赉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在育成学院任教。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并致力于民族的振兴，在旗内青年中很有威望。

他们进行了很重要的商谈。讨论了将要建立的组织的名称、性质、宗旨和任务。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提出成立“自治州”，或者组建“蒙古青年同盟”。刘健民提出郭前旗是多民族地区，组织单独的蒙古青年同盟是不是合适？陶特格琦说：“‘世界大同’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世界大同，各民族都平等，就叫‘大同会’吧。”他们统一了认识。

会后，刘健民去了长春。

他们在 8 月 17 日成立大同会，通过会章，选举陶特格琦为会长，高万宝扎布为宣传科长，拉西道尔吉为总务科长。大同会宣布成立，挂了牌，还在松竹梅饭店举行了成立宴会。

大同会也在郭前旗其他民族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会员。

居怀珠是第一个参加大同会的汉族会员。大同会文工团员多数都是汉族知识分子。

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马杰耶夫斯基上校率领一个团进驻郭前旗。

大同会成立后，需要住处和活动场所。通过协商，苏联红军同意他们占用敌伪财产。于是教育会馆独门独院的三幢洋房，德升旅馆“□”字形大院蒙民厚生会的房子都成了大同会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大同会针对当时形势，还办了“《曙光报》”。

就在日寇投降，敌伪残余们感到大势已去的时候，8月15日，伪旗长达木林多尔吉秉承国民党的旨意，纠集伪官吏、社会显要，匆匆成立了个维持会，自任维持会会长，委请国民党郭前旗党部书记长、原农业学校校长蒋晓予任秘书长。责成伪旗警备队长、旗警察署长陈达利为治安大队队长，并由陈达利收罗伪警察、土匪700余人，成立了治安大队以及下属的4个治安中队。

大同会的成立，在维持会、治安大队头头眼里，认为这不过是一群青年的心血来潮，听说有个八路军刘健民帮助成立大同会，他们并没把这回事放在眼里。不料，9月3日，长春市召开抗战胜利庆祝大会，电台、报纸都发表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吉长部队司令员刘健民在大会上的讲话。这对郭前旗也是个震动。维持会的“达官贵人”们，才觉得这个大同会不可等闲视之了。

(三)

日寇刚刚宣布投降，急切攫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依靠

美国空军和海军，不停地向东北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并派遣大批“接收大员”和特工人员快速潜入东北，与敌伪军官吏相勾结，收编伪军、纠集警察、土匪，组织所谓“光复军”、“保安队”、“治安队”充当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先头部队。

毛泽东主席以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敏锐的洞察力早已预见局势发展，预见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8月13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敌人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立即派10万大军，2万干部从各个根据地奔赴东北。

伪满时一直坚持在东北抗战的我北满地区第一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嫩江第一纵队司令员夏尚志率部到郭前旗，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接收了苏军缴获日军的马炮、三八野炮、山炮、轻重机枪和一批弹药。高万宝扎布代表大同会汇报了大同会成立以来，治安队时时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

夏尚志，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2月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兵委书记，后担任抗联一个军的军长。来前曾听说刘健民在郭前旗组建了一个蒙古族进步青年组织大同会。他听了高万宝扎布的汇报，指出，应尽快组建蒙古人民革命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残余势力，争取蒙古族民族解放。还答应帮他们解决武器装备。

夏尚志的谈话激励了大同会员。人们立刻活跃起来，当即组织了3个招兵工作队，分赴王府、新庙、大老爷府。向蒙古群众宣传，为了蒙古族的解放，穷苦人民的翻身，郭前旗要建立蒙古人民革命军。这得到了各地蒙古族人民群众的响应。不到一个月，就有200多人参加了军，都是蒙古族贫苦牧民的子弟。驻在扶余的新四军部队还给了他们一些军装和枪支弹药，

于是他们正式建成了蒙古革命军。

1945年10日，蒋介石攻占山海关后，大举进犯东北，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郭前旗党部书记长蒋晓予与治安队狼狈为奸，妄图搞垮大同会，以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大同会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决定寻找战机，抓获蒋晓予，给以严惩。在一次行动中，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激烈的战斗中，八路军张排长和大同会会员，年仅26岁的医科大学学生胡力陶，壮烈牺牲。

为吸取血的教训，教育会员继承烈士遗志，大同会举行了追悼会，夏尚志认为蒙古革命军需要进行正规整训。决定蒙古革命军过江到扶余编入长白纵队三团二营。冉正合（部队干部）为团长，高万宝扎布为政治处副主任，营长德海，副营长图们敖其尔（高士哲），教导员贺喜格。通过正规训练，提高了蒙古革命军的政治、军事素质。

1945年12月初，远从太行山区来的黎晓初、田铁军被分配到了郭前旗，指导大同会工作。

1946年1月，从新四军三师、抗大五分校、晋察冀和陕北来东北开展工作的王央公、南阶池、周守成、李祥麟、阎平波、车友民、赵渊等50多名同志先后调入郭前旗。正式建立了中共郭前旗委。旗委书记为王央公，副书记为南阶池。

根据吉江地委和行署的指示，解散了治安维持会，选举成立了郭尔罗斯前旗人民政府。王央公对成立旗人民政府特别强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处理民族事务要慎重。讨论候选人的时候特别激烈，大同会成员和群众代表要选举王央公当主席，上层势力要选达木林多尔吉为主席。王央公又进一步做工作，说：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应当选在一个蒙古族中有威望，又有群众基础的人做主席。乌

勒吉布彦是蒙古族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上层进步人士，伪满时为教育科长，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大同会，倾向革命。选举结果是乌勒吉布彦当选旗人民政府主席，王央公当选副主席，陶特格琦任秘书长。旗政府建立后，各区也开始建区委和区人民政府。区长多由大同会蒙古族同志担任。区委书记（当时党未公开，对外称政委）和副区长由部队来的同志担任。

1946年3月吉江省委、行署、军区驻地由洮南迁来郭前旗，管辖范围包括扶余、郭前旗、大赉、乾安、农安、德惠、长春、肇源、肇州、肇东十县（旗）。刘震任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军区政委，郭峰任行署主任。同时，由曹里怀任司令员、郭峰任副政委的吉黑纵队进驻扶余。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也驻郭前旗休整待命。

为加强地方军队建设，高万宝扎布特地找曹里怀、郭峰汇报了大同会和蒙古革命军的建设。并介绍了治安队的复杂情况。他代表大同会要求吉黑纵队解除治安队武装，装备蒙古人民革命军。曹、郭对这个问题当即指出，郭前旗是蒙汉杂居地区，治安队虽然成分复杂但多为蒙古族，在他们的罪恶活动还没被群众，特别是蒙古族群众认识清楚的时候，如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去缴械，就容易被反动分子利用，挑起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对开辟郭前旗工作不利。并进一步指出：蒙古族的问题应当由蒙古族自己去解决。可以把两支武装合编成蒙古骑兵团，让陈达利当团长，我们派政工干部。他接受，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革命军队；他拒绝，或者他明接受暗搞鬼，那就是他的一种自我暴露。大同会和革命军方面同意了合编的意见。陈达利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他不得不同意合编，同意他当团长，黎晓初任政委，高万宝扎布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不同意向连队派政工干部。

部队合编了，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力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成功，但对万一不测，也时刻防范着。

（四）

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饱受奴役、欺凌、蹂躏、分裂之苦的蒙古族劳动人民、蒙古族知识分子、蒙古族进步人士，渴望结束以往屈辱的历史，渴望把自己的民族建成为一个团结、统一、自治、繁荣的民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解放初存在于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民族热”。

郭前旗大同会成立后，刘健民几次给大同会会员讲课，讲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讲蒙古族的民族解放之路。大家感到刘健民讲得实际，讲得深刻。刘健民的引导和他回长春后多次寄来的《论联合政府》、《时局和任务》等等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蒙古族的解放是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富强、繁荣，就没有一个民族的富强、繁荣。

但是，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科学的民族观、世界观，常常是要通过自身的反复实践才会形成的。

1945年8月下旬，陶特格琦从王爷庙回来时，向朋友们讲述了王爷庙的形势。其中有一个使人震惊的消息，就是王爷庙以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为首的蒙古族进步人士在那里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提出“内外蒙合并”并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就在这时，苏联红军进驻郭前旗，也进驻了长春市。驻长春苏联红军的一个布利亚特蒙古人桑杰少校给他们寄来了苏联红军在长春编印的《苏联红军蒙文报》。这个报的第一期就全

文刊登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外长王世杰签订的。条约中写道：“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以现有疆域为领土，经过全民投票同意，成为独立国家”。大同会的会员们意识到按照这个条约，外蒙古已成为被中国承认的独立国家，内蒙古属于中国领土，“内外蒙合并”的主张显然是不现实的，是不能实现的。

1945年9月中旬，王爷庙的桑杰扎布（郭尔罗斯前旗小城子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扎兰屯师道学校校长）来郭前旗，要求去见刘健民。高万宝扎布、桑杰扎布、乌尔图等同志去长春见到了赵东黎、刘健民。桑杰扎布汇报了王爷庙一带的革命活动。同时，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就这样，通过郭前旗大同会的工作，建立了东蒙革命力量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这次长春之行后，王爷庙方面派特布信，郭前旗大同会派张增命、吴连春、贺喜格等人到长春参加马列主义读书班。同时，大同会会员也加强了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民族团结，把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

1946年1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在葛根庙召开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东蒙自治政府。中共郭前旗委派高万宝扎布等7名代表参加。其中厚和是青年代表，乌亚琴是妇女代表，还有几个民族上层代表和群众代表。

这次代表会，使郭前旗代表有机会见到了许多外地代表。了解到了国民党方面对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态度。

其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无意搞内蒙古自治，已将东北分为九省，东蒙地区划归兴安省，并任王宗洲为省长。

其二，1946年国民党占领阜新后，无视阜新10万蒙古族人民的存在，只建一个阜新县。土默特左旗世袭王爷云丹桑布

去找国民党东北军政要员杜聿明，杜说，已经建立阜新县，一个地区怎么可以有两个政府。干脆不准成立旗政府。

其三，国民党在一个声明中竟公然露骨地宣布：“内蒙仅为历史上的名词。”

听到这些，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已经昭然。蒙古族人民把内蒙古自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这次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发电祝贺，并派胡秉权同志列席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国民党开始发觉他们在对待内蒙古问题上有些失策。于是匆匆忙忙地与“九三”前投降日本侵略者的蒙奸、伪蒙疆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相勾结，用飞机把德王接到重庆，在蒋介石的卵翼下，进行罪恶活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又与原日伪兴安总省秘书长玛尼巴达拉相勾结，达成“拥蒋反共”密约，掩护军统特务携电台到王爷庙进行特务活动。国民党这些倒行逆施一出台，立即遭到蒙古各界人民反对。前伪兴蒙委员长松津旺楚克等 15 位上层人士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绝不允许战争罪犯德王逍遥法外。我公安机关还依法逮捕了玛尼巴达拉和国民党军统特务。

为统一东西蒙自治运动，加快内蒙古自治运动步伐。1946年4月3日乌兰夫受中央委托在承德召开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通称“四·三会议”，也称“承德会议”。会议决定内蒙古的自治运动统一由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来领导，自此统一了东、西蒙的自治运动。

同年5月25日，在王爷庙召开了第二次东蒙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次贯彻“四·三”会议精神的大会。中共郭前旗委派高万宝扎布、厚和等同志再次参加了大会。大会代表 300 余人，列席代表及来宾达千人。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主任张

策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鉴于东蒙自治政府成立时曾申明内蒙古自治运动有了统一机构后即撤销的意见，现在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经成立，现撤销东蒙自治政府。由东蒙总分会代替其职权，并申明东蒙总分会受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并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这次会上东蒙人民革命党亦宣布解散。

会后，郭前旗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郭前旗支会，陶特格琦任主任，厚和、晓波任副主任。支会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并在新庙专门办了一所技术学院，旨在利用短期培训班培养干部。于是全旗的自治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五）

1946年5月，是个风起云涌的5月。

国民党和平谈判的戏，演完了，军队也调运完了，已经到了撕毁停战协定的时候了。

我党中央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毛主席在1945年12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就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到“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去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按着中央的指示，我军迅速地放开脚步有组织地战略撤退。

我军5月19日从四平撤出。

接着，又主动从长春撤出，国民党军队5月22日进占长

春。

我军从长春撤退后，立即用火车车头牵引扒路机械扒路。一天之间，扒掉了从农安到大赉城的 150 公里铁路。转眼间，枕木、道钉被沿线群众搬运一空。

中共郭前旗委、旗人民政府已经搬到乡间。区长、区政委几乎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整天带领武工队深入群众，发动锄奸反霸斗争。青年、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盘查坏人。军民一心、党群一心，拉开了以草原为战场，打一场游击战的架势。

为了便于旗委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也为了便于控制陈达利，吉江军区刘震司令员下令，沈启贤参谋长率领一个步营和蒙古骑兵团陈达利团长、黎晓初政委率领的三个骑兵连一起到乾安、农安边界一带剿匪。

这时国民党占领了农安，战线在向北推进。

郭前旗的敌人，错误地估计形势，觉得他们东山再起的时机就要到了。

伪旗长达木林多尔吉仓皇出逃。在长春、吉林几次求见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未能获得委任。于是跑到农安成立了个“郭前旗流亡政府”。

蒙古骑兵团一营在王府站的留守人员奉吉江军区命令撤回前郭旗。在撤离的晚上，二连司务长刘炮，勾结土匪摸进二连驻地，胁迫投南。排长铁树严词痛斥，于是，发生了王府站流血事件。二连文书王凤岐乘混乱之机跑出，向我一连报告，刘炮得知才匆匆带领匪徒出逃投南。

这时，随主力剿匪的陈达利与他的亲信们的秘密往来也日见频繁，行迹可疑。沈启贤参谋长（当时已任七旅旅长）指示蒙古骑兵团北撤，回郭前旗整训。

当他们回师郭前旗经过边界哈拉毛都时，陈达利向黎晓初提出在小城子（陈达利老家，大老婆处）住两天休整一下。黎表示同意。

黎晓初进入了陈家大院，在陈达利杀猪宰羊的款待中，他感到了这里透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氛。

陈达利在这里“休整”，是等待什么呢，还是要在这一集中兵马转道投南呢？

陈达利向他说：“你放心，老蒙古心善，不会杀你的！”这更增加了黎晓初的警觉。

黎晓初不露声色地按惯例召开政工干部会，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他掌握着主动权。

陈达利请他出席全体大会，这是一个弹上了膛的会。黎晓初对干部、战士一针见血地讲，有的人看国民党北犯有一些心慌，想投南。他又告诫说，想投南的要想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子女还在郭前旗，况且南去的路上还有我们部队。讲话击中了要害，有些满脸凶气的匪徒低下了头。陈达利下令出发回县。

就在这时，我公安机关在郭前旗逮捕了国民党特务刘殿海，搜出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委任陈达利为农安、扶余、郭前旗、乾安新编旅旅长的委任状。

骑兵团返回郭前旗后，陈达利谎报匪情，请命去新庙剿匪。军区领导通过电话，迅速查明，陈达利请命有诈，匪情是假的，果断决定逮捕陈达利等人。1946年6月4日（端午节这天）召开公判大会，公布了陈达利等人的罪行。危害地方多年的陈达利被枪决，使人心大快，这起预谋反革命叛乱终于平息了。

1946年6月，根据中共西满分局决定，中共吉江省委、